

※ 學人介紹 ※

朱師轍的生平、著述及其他

丁 紅 *

朱師轍這個名字，對於當代大部分學者來說，也許並非耳熟能詳。但在民國及五〇年代初期，他卻是一位頗有名聲的經史小學及詩詞家，曾任清史館協修，先後受聘中國大學、中山大學教授，「才性備具，學識廣博」^①，著作豐碩，晚年定居杭州，為浙江省政協委員，倍受毛澤東、陳毅、葉劍英等領導人的關懷，是一位頗有傳奇色彩的著名學者。由於各種原因，學術界對朱師轍的了解與研究迄今尚未展開，陸鍵東所撰《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一書中對朱氏生平雖略有述及，卻因資料的缺乏而難以確切與全面。今年（一九九九年）正值朱師轍誕辰一百二十周年，筆者從浙江圖書館古籍部所收藏的朱氏詩詞、文章、信札、專著等第一手資料入手，對其生平經歷和學術成就等作了初步的研究，冀盼能為學者進行此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些線索。

一、家世與生平

朱師轍，字少濱，號充隱，別號瀛台寄主、東華舊史、西湖夢人，清光緒五年（1879）三月二十三日出生在安徽省黟縣石村。朱家「世代儒生，書香傳家」^②，遠祖徽國公居新安，到明朝有思親公自新安徙河南，再徙蘇州，清咸豐年間，其先人為避戰亂，選擇安徽黟縣石村作為定居地，世以儒著，九傳到其府君，清代著名小學家朱駿聲，世稱豐芑博士，就是其祖父。豐芑博士係嘉慶二十三年舉人，官黟縣

* 浙江圖書館古籍部副研究館員。

① 朱師轍：《黃山樵詩鈔》（四卷本），徐謳玉序。

② 朱師轍：〈先考仲我府君行狀〉。

訓導，著作百餘種，咸豐年間進呈《說文通訓定聲》一書，清廷賞國子監博士銜，名著中外。駿聲之子名孔彰，即朱師轍的父親，乃光緒八年舉人，早年曾做過曾國藩的幕僚，歷任沂南書局、蒙城書院、江楚編輯局主管，後受安徽提學使沈曾植之聘，教授安徽存古堂，民國成立後，受聘任清史館協修，生平撰著頗多，也是一位著名學者。

朱師轍幼小喪母，體弱多病，但仍接受中國傳統的正規教育，初讀《毛詩》、《爾雅》，接著又讀四書五經，塾師還督習試帖和八股文。這種訓練雖然非他所喜好，但七、八塾館課程的啓蒙教育，給朱師轍打下了最初的國學基礎。一八九四年，十五歲的他隨父入江寧，開始涉略子史。一八九五年入泮學，第二年考試一等，因同桌吳某的親戚懇求，朱師轍讓出稟缺而輟學。一八九六年其父朱孔彰應歷任安徽鳳陽知府、山西按察使、安徽布政使巡撫的馮煦之聘，主修《鳳陽府誌》並兼長淮南書院，朱師轍侍奉父親同住淮南書院，院有藏書，這為他閱讀書籍提供了方便。他開始比較認真地讀史書，「自漢至五代諸史及《通鑑》」皆加檢閱，「又輔以雜史、諸子文集」^③。史書雜文的無窮魅力，使他專心一意地在書海中沉潛漫遊。由於熟讀史書，熟悉史事，父親要求他「詠史」。朱師轍便遵照父親要求，開始學習寫詩。大量的閱讀與自身的勤奮練習，為朱師轍日後在經學、歷史及詩文詞曲方面的研究與創作奠定了紮實的根底。一九〇二年，朱師轍以「經古第一」順利進入蘇州長洲縣地方學校為庠生。一九〇五年升入江南高等學堂，一九〇七年畢業。當時與湖南的曾熙並為大家的著名書法家李瑞清（字梅庵）為兩江師範學堂監督，看到朱師轍文筆優異，除給獎譽外，還函薦於安徽提學使沈曾植。沈曾植因對朱師轍也頗為賞識與優待，稱其「少濱雅士」，特為他設秘書使司之職，聘其任安徽學務所秘書。機要工作並不繁重，只是一般尋常公牘事務，沈氏意在為他創造一個良好的讀書環境，使其「從容博覽衆籍可大成」^④。其間朱師轍還兼有安徽優級師範教員的工作，前後共五年。除擔任秘書、教學工作外，朱氏此時已開始自己獨立研究的生涯，《商君書解詁定本》就在此時著手撰著。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發，次年一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黎元洪為副總統兼參政院長，朱師轍任職參政院秘書，院長、秘書長印皆藏總務科鐵匱，歸他典掌。在

③ 朱師轍：《黃山樵詩鈔》（四卷本），朱師轍自序。

④ 朱師轍：〈戊寅六十初度自述〉，《黃山樵詩鈔》（四卷本），卷3。

袁世凱北洋政府其間，院中議決總統繼任案，由袁世凱書三名候選人，藏南海金匱石室中，等袁世凱死後，再啓金匱，就三人中投票選舉。金匱鑰匙有兩把，一存總統府，一存參政院，存參政院的那把金鑰匙用黃綾緘封藏鐵匱內，也由朱師轍掌管；由於參政院議決重要各案呈文皆由秘書長林長民親自交朱師轍蓋印，所以秘密文件多所目睹，朱師轍曾打算「他日記之，亦民國之趣史也」^⑤。在掌管秘書工作的同時，他還兼管秘書廳的圖書，內有觀海堂、方略館、資政院書館等藏書不下百萬卷，且多秘本，朱師轍皆過目，並編有三館目錄。前後居南海瀛臺凡四年，一九一五年袁世凱竊號洪憲，復辟帝制，朱師轍離開了參政院。

一九一二年袁世凱意欲籠絡清廷遺老，設立清史館，以趙爾巽為館長，聘請夏孫桐、柯劭忞、王晉卿、尹石公等一批清季學者編修清史，朱師轍之父朱孔彰也被聘為協修。師轍隨父身居清史館，雖未正式從事修史工作，然「史宬載筆，追隨諸老，遺事研究」^⑥卻是他的心願，因此只要有空，他就盡力爭取參與，其間協助父親查找資料，並樂於承擔贍錄之事。一九一九年，朱師轍開始著手整理校勘祖父朱駿聲的遺稿，一九二〇年初校畢《傳經室詩存》四卷。這一年其父去世，清史館復聘朱師轍繼任協修。從任清史館協修始，到一九二七年《清史稿》告成，朱師轍先後撰寫了《咸同列傳》，整理《清史》全稿，纂修《清藝文志》^⑦，業績可觀。一九二一年各省皆建大學，文字學為重要課程，當時北平中國大學設有文學系，系主任是朱師轍父親的門生胡春霜，胡氏堅邀朱師轍擔任文字學教授，因此，朱師轍在清史館期間，還兼任北平中國大學和輔仁大學兩個學校的教授。一九二五年故宮博物院成立，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館長沈兼士聘朱師轍為文獻館專門委員及博物院顧問，幫助整理清朝檔案。由於朱師轍在參政院和清史館先後工作十年，對皇史宬與瀛臺情況較熟，在他的努力疏通和策劃下，原歸國務院的方略館、觀海堂、資政院書館和軍機處檔案，以及清史館的國史館、實錄館的數百萬卷秘籍全部歸屬文獻館（方略館、觀海堂、資政院書館的藏書有一半早年已歸松坡圖書館）。

資政院書館一九二六年，朱師轍受河南大學之聘，離北平去河南開封任教，

⑤ 同註④。

⑥ 朱師轍：〈自我批評〉，《黃山樵詩鈔》（十卷本），卷7。

⑦ 朱師轍：《清代藝文略》，朱師轍自序。

專授《尚書》通史。一九三〇年因病離校休養，其間因友人夏孫桐、邵瑞彭堅邀，曾入聊園詞社，病癒後於一九三二年返校繼續教學。時在詞學名家邵瑞彭的幫助下，將所撰詞集為《黃山樵唱》付梓，但詞不及百闋。一九三四年，他又受成都華西大學文學系主任程芝軒之聘，於一九三五年二月赴成都任教。其間朱師轍除教學工作外，繼續校勘先祖遺稿，一九三五年編輯朱駿聲手稿《小學識餘》五卷，校畢《六十四卦解》，撰寫《音韻學叢考》，編成《釋詞源流匯編》。一九三七年夏為了調查出版《釋詞源流匯編》一書印刷工費事宜，他趁暑假返回北平，不料旬日之後發生了盧溝橋事變，日寇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抗日戰爭全面展開，為此他不顧家庭安危又匆匆返回成都。一九三九年朱師轍病重，經校方同意，自成都乘飛機至昆明轉香港抵上海就醫，至當年的秋天病癒。此後北平輔仁大學再三約請朱師轍返校任教，他亦因此再次任教輔仁，教授「校勘學」。一九四三年九月，他又受聘請於中國大學，主講《尚書》研究。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成都華西大學堅邀朱師轍返校，因道路阻塞之故始終未能成行。同年十二月十五日，蔣介石為慶祝勝利，在北平懷仁堂開茶話會，慰勞中外耆英，朱師轍奉邀赴會，蔣介石走至朱氏身前，與之握手留影。一九四六年朱師轍受聘於安徽學院。一九四七年廣州中山大學校長王星拱力邀朱師轍南下任教，同年十月遂赴廣州任教，為一級教授，教授《詩經》及研究清史，《清史述聞》成稿，刊於《嶺南學報》第十一卷第一期。

一九五一年，朱師轍退休，在陳毅關懷下，擇地杭州定居，為浙江省政協委員。他遍訪住杭名士學者，結交文史界耆宿，常與酈承銓、邵長光、陳錫鈞、陳訓慈、孫孟晉等委員會晤。時以省政協委員的身份去各地視察，並應邀出席各種學術活動和紀念活動。文化大革命前，他雖然年歲已高，體弱多病，手腕顫抖厲害，仍致力於學術研究工作，《通鑑釋例校正》、《北魏六鎮考辨》等皆在此時定稿。同時堅持詩詞創作，就是在大動亂的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間，他還寫有《黃山樵唱》二卷。一九六九年逝世，享年九十歲。

二、治學成就及文學創作

朱師轍以湛深經學，精於訓詁校勘而著名。他稟承家學，國學根底深厚，十五歲時就能解決當時名宿不能解決的難題。時在一八九四年，漢學家姚永樸執教於安

徽高等學堂，選《商子》變法為講議，篇中有「郭偃之法」一語，卻不知郭偃為何人，問遍名宿未得出處，正巧遇上安徽提學使沈曾植招朱師轍赴皖，遂讓他查找，朱師轍很快從《晉語》中證實，郭偃是晉國掌卜大夫，衆人無不驚嘆佩服他對經籍的熟悉。弱冠時他讀先秦諸子，又撰有〈考證流別〉一文，連當時監督江南高等學堂的著名學者李瑞清也向他索閱（此文稿因此被遺失）。他以後的治學範圍，則經史子諸部皆有涉及，而尤以研究經史深入廣博著稱。

在治學過程中，朱師轍最重視經部小學，認為它是一切學問的基礎，是談經考史、著述立說的根本，因此他對文字學、音韻學的研究都花了相當深的功夫。撰有《音韻述要》，論音韻源流、音韻反切之始、音韻叶韻之非、字音準則、詩古韻表二十二部表說等，建立起自己的古韻學系統。在各大學任教期間，缺少文字學教材，他便引用自己的研究成果，編寫了既總挈綱要又簡明易曉，全面敘述古韻發源及變遷進步，自文字萌芽至字書發展的歷史講義。以前學者很少從讀韻的角度去研究〈荀子·成相篇〉，他便採集各家之說，並作韻讀補釋。除注明古韻，還考證出出「相」是小鼓，敲以唱歌，韻是俗歌調，實在是今時大鼓的始祖，可以與屈原《離騷》抗衡。他另撰有《釋詞源流匯編》、《六書例解序》，專門研究字詞的轉注及假借方面內容。朱師轍研究《尚書》也很勤奮，寫有《專經·研究尚書》，敘述《尚書》百篇異同、《尚書》句讀、《尚書》古今文、《尚書》韻讀等問題，並在教學中專開「尚書史」一課。

朱師轍尤其喜歡研究歷史，他認為「學子不讀史，曷足知古今國家興衰，政治得失，學術變遷，焉能成為有用之才」^⑧。所以他在各大學教授期間，擔任了不少通史或斷代史的課程。他專門研究了魏晉六朝史，撰有《魏晉南北朝社會文化史》，全書分九篇。(1)總論三國至隋社會文化變遷的要旨；(2)三國社會文化變遷的推求；(3)清談之利弊；(4)九品中正制度的利弊；(5)門第族望的形成；(6)婚姻習俗；(7)喪禮制度；(8)佛教的興盛；(9)道教的變化。另附魏晉南北朝統治世系簡表。他對清史研究更情有獨鍾，所涉獵的面甚廣，歷史、藝文、遺事掌故諸方面都有較深的探究。在清史館任協修時，他承擔統串《清史》全稿、編纂《清史藝文志》等任務。在《清史稿》刊行廿餘年後，他又撰《清史述聞》一書，對修史的經驗利弊、清史統一體例的辦法、未被披露的遺聞佚事等作了全面系統的闡

^⑧ 朱師轍：《通鑑釋例校正》，朱師轍自序。

敘，使該書實質上成為論述史書體例的專著，並為閱讀清史及研究近代史學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資料。他感到整個清代史部著作雖不乏宏篇，但都是「條考雜記為多，能總挈綱要，提綱挈領，筆削纂述，成一家言，而為史之正宗者蓋寡」^⑨，因此他還曾打算撰寫《清史紀事本末》，惜因修史和教學繁忙而流產。他還撰有《史記補注》、《通鑑釋例校正》、《通鑑問疑校正》、《通鑑補注》、《北魏六鎮考辨》等史學著作。

朱師轍對子部著作也有研究。戊戌變法後，隨著西學東漸，新政實施，純考據訓詁的治學道路已顯得遠離現實，無裨艱時，因而學術界出現漢、宋兼採的傾向，主張「古訓明而後義理明」，在這一學術嬗變的過程中，朱師轍也承應時風，要為新政實行憲治提供一個歷史的借鑒。他想到了《商子》一書，此書主張法治，實行農戰，加強集權，這在朱氏看來，正是「當今之要務」^⑩。但《商子》一書文質字古，向以難治而聞名，所以一直很少有人研究。清代雖有嚴萬里（即嚴可均）校本問世，稍微可讀，然而舛誤妄改之處尚多。朱師轍則仿孫詒讓《墨子閒詁》的體例，以嚴本為主而解詁，與明朝以來的二十幾個本子校勘，考訂異同，糾正謬誤，擇善而從，疏通義理，依附於嚴本每條文之下，經過幾年的功夫，撰成《商君書解詁定本》初稿，一九二〇年由上海廣益書局出版。時人評稱：「疏通古訓，精確詳核，商君書始可讀。」^⑪以後朱師轍仍不間斷地加以考證補充，經過數十年的研究得以定稿，並糾正了孫詒讓誤把嚴萬里與嚴可均分為二人的錯誤。

朱師轍認為「清一代學術以子部為最衰，率多考校注釋秦漢諸子，其雜考經文，糾正史事，匯編而成者亦衆，至於發揮學說，自創宗風，獨立成家者則鮮」^⑫。朱師轍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填補了這方面的不足，其最具個人理論色彩的成就，即有關校勘學的一家之言。入清以來，學者治學雖頗運用校勘之法，但未能意識到這種治學手段本身可以作為一種學科來看待與研究。朱師轍則用自己幾十年治學積累的經驗和感受，撰寫成《校勘學》^⑬，全面系統地闡述了校勘學的理論、源流、方法，用大量的例證說明古籍必須校勘的依據。同時朱氏在進行學術研究時，也十分注重具體古籍的

⑨ 朱師轍：《清代藝文略》，朱師轍自序。

⑩ 朱師轍：《商君書解詁定本》，朱師轍自序。

⑪ 朱師轍：《商君書解詁定本》，胡玉樸序。

⑫ 朱師轍：《清代藝文略》，朱師轍自序。

⑬ 朱師轍：《校勘學》十卷，筆者在 1984 年前後為高校古籍委員會複印朱氏著作時見過此書。

校勘，所以經他校勘過的書籍，其資料的可靠性倍增。一九五五年文化部古籍出版社出版《資治通鑑》標點本，特向朱師轍索借所撰《通鑑釋例校正》、《通鑑問疑校正》、《通鑑補注》三稿本作為糾錯的依據。清代的學術研究工作，是由反對宋人專談性理之學，而形成為專門研究訓詁、箋注的漢學，並發展成考據學；戊戌變法以後，考據學又蛻變成一種有利現實社會需要的學問。朱師轍基本上繼承了傳統治學的路子，對治學的方法加以理論性的總結與提高。這對於後人深入研究祖國的文化遺產，無疑是有益的。

中年以後的朱師轍又十分愛好詩詞創作。朱師轍早在一八九八年十九歲時就學寫詩，詩品獨宗李商隱，結合當時熟讀史書的心得開始寫「詠史」詩。現在他的詩稿中所存《詠史》諸篇皆是弱冠時的作品。進入參政院後，他仍沒放棄作詩，並「喜讀古詩十九首」，欽佩陶淵明、王維、孟浩然的詩體格清超，神味雋永^⑭。入清史館後，與當時學者名人朝夕相處，尤其是與「時稱詞北平的邵瑞彭、尹石公、陳匪石詞學名流常有酬答」^⑮。四十歲時在校勘他父親遺著《臨嘯閣詞》時開始學習「倚聲」，也就是填詞，那時雖說他的作品不多，但詞學名家邵瑞彭讀後卻稱讚不絕，並勉勵不要放棄。夏孫桐建議他學夢窗詞，可是朱師轍獨好周邦彥的《清真集》。一九三〇年在家養病時因夏孫桐等再三約他加入聊園詞社，在社中相互磋商唱和約一年，收益甚大，從那開始時復吟詠。這樣朱師轍又以詞學新進，在這一領域引起了同仁的矚目。

一九三八年暑假，因日寇入侵，抗日烽煙遍及全國，加上那年中原洚水橫流，江、漢、巴、渝路途多阻，朱師轍被困留校園。此時因天災人禍、欲歸未得而生的悲憫之懷，以及興亡所寄滿腔的滄桑之感，強烈地激發著朱師轍的創作慾，從那時起朱師轍基本沒有間斷創作，就像他在《續和清真詞》序中所寫：「神州陸沉，人間何世，滄桑變幻，黍離哀思，悲歡離合之情，舊恨新仇所寄，涉筆便成，觸興即發，美不知所以然。」此時的朱師轍已是個很有影響的詞家了，正如他自己所記：「余家以經史著，而蜀都耆宿夙推余為詞人。」^⑯

朱師轍的詩，晚年結集為《黃山樵詩鈔》（最初名《綺霞樓詩鈔》，中歲更名

^⑭ 朱師轍：《黃山樵唱》，朱師轍自序。

^⑮ 朱師轍：《續和清真詞》，朱師轍自序。

^⑯ 朱師轍：〈蜀都講學謝病歸自嘲〉，《黃山樵詩鈔》（四卷本），卷4。

爲《充隱詩稿》，最後定名爲《黃山樵詩鈔》）；詞集則有《黃山樵唱》和《清真詞朱方和韻合刊》、《續和清真詞》。這些作品集中既有朱氏與清史館舊交好友的唱和，也有和毛澤東的長征詞韻，作品的時間跨度長，經歷了辛亥革命、民國成立、北洋政府、日寇侵華、人民政府成立、文化大革命的災難等各個歷史時期，反映了作者幾十年的人生經歷、教學活動和思想情緒，也記下了時局變幻和人情世態。名家徐映璞（韞玉，浙江省文史研究館館員，已故）評稱道：「先生之詩，少年志在運典，中歲旨在言情，以後純乎寫意。意念奔赴，筆亦隨之，不以地而更，不以時而異，不以人而變，率真亢爽，盡所欲言，在家即譜乘之資，在國備輶軒之采，足以傳世。」^⑯

三、整理先人遺稿

朱駿聲、朱孔彰、朱師轍祖孫三代，積年來著作百幾十種，因家貧無力梓行，在朋友的協助下，只有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朱孔彰《中興將帥別傳》等少量著作刊行於其生前。朱駿聲的《尚書古注便讀》於道光十三年在濟南脫稿後，過了二十四年，才有友人梅鏡蓉相助商議刊行，又因發生太平天國戰爭而流產。所以朱家傳世著作絕大部分沒能刊刻於世。朱師轍認爲祖父「邃於經小學」，其著作是「小學之津梁，空前傑作」^⑰；又在爲其父《六書例解》題序時稱：「清代以著作稱世，爲桂馥、段玉裁、朱駿聲、王筠四大家，流風所被，海外亦崇許學。日本明治時有說文學會，歲奉祀典，中國自漢許叔重始，宋則二徐（徐鉉、徐鍇兄弟），清爲桂、段、朱、王四大家，共七人皆列入祀典，可謂盛矣。而清四大家中，尤以先大父《說文通訓定聲》爲最廣，尤有裨於學者。」^⑱可惜歷年來遺稿散佚頗多。在耆儒朋輩的鼓勵下，朱師轍明確制定自己的學業計畫，「文章學術昭清代，前輩風流應繼承」^⑲。爲了繼述家學，他畢生傾注很多時間與精力，收集、校訂、增補、編輯出版祖、父兩代的遺著。一九二〇年校畢朱駿聲《傳經室詩存》；一九三

^⑯ 朱師轍：《黃山樵詩鈔》（四卷本），徐韞玉序。

^⑰ 朱駿聲：《學易劄記》卷首，朱師轍題識。

^⑱ 朱孔彰：《六書例解》卷首，朱師轍題識。

^⑲ 朱師轍：〈赴粵雜詠〉，《充隱詩稿》，第7冊。

二年搜集其父殘稿《臨嘯閣詞四種》，復得拾遺二卷六十九首；一九三三年校畢《經詩答問》。雖然朱師轍孜孜不倦地整理先人遺稿，但仍「藏之篋衍，乏資付刊」^{②1}，無奈之下，他公開向世人求助，一九三五年他在《臨嘯閣詞》的題識中寫道：「先大人遺著甚多，尚望海內大雅匡助刊行，不勝盼祈。」在朱師轍的努力下，到一九三八年已刊廿餘種，然需整理的未刊遺稿仍較多。隨著自己年歲增長和刊書的艱辛，朱師轍感到內疚與焦急。他在〈粵遊雜感五絕〉中寫道：「自慚辜負耆儒望，難繼前修學術傳。」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朱師轍乾脆直接上書國家主要領導人，力求實現自身無力完成的心願，刊刻先人遺著，傳播家學。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二年期間，他先後給毛澤東、董必武、周恩來、陳毅等中央領導人致信，並奉送其祖父、父親及本人已出版的書籍。意外的是毛澤東在收信後，竟然親筆給朱師轍覆函問候，全文如下：

少濱先生：

九月二十五日惠書並附大作各件，均已收到，感謝先生的好意。

謹此奉覆，順致敬禮！

毛澤東

一九五一年十月七日

此信信封署寄：「廣州文明路中山大學北齋十二號，朱少濱教授。」朱師轍喜獲毛澤東的問候信，視為晚年最大的榮幸，當時吟詩二首，以作紀念：

琅函飛下九重天，堯舜都俞在眼前。想見幾餘揮翰墨，板橋風味尚依然。（其一）

七四孱翁興不窮，開函肅敬對毛公。回懷元首關懷意，尊重儒宗禮更隆。（其二）^{②2}

朱師轍激動又欣喜的心情，躍然於紙上。不久，在一次會議期間，毛澤東接見赴北京開會的廣東省文教廳廳長杜國庠，特別詢及朱師轍情況，囑杜國庠與中國科學院郭沫若院長商量出版朱氏先代遺著事宜。在毛澤東這種特殊的關注和政府有關部門安排下，朱氏遺書得以順利出版數種。

後因出版社縮小，不少遺書沒能繼續出版。無奈之下朱師轍又想到，「余家三

②1 朱駿聲：《臨嘯閣詞》卷首，朱師轍題識。

②2 朱師轍之詩稿散頁，原件藏浙江圖書館古籍部。

代之著作，雖有毛澤東、董必武兩主席提倡出版，尚須總理贊助實行」^㉓，因此又上書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求援，他這樣寫道：

總理鈞鑒：

先生學貫中西，才兼文武，折衝壘於壇坫，功業著於旂常，眾所心傾，尤爲欽仰。近日旌麾蒞杭，荷承招宴，沃聞偉論，歡忭無似，謹戲詩一章，聊表微忱，錄呈誨正。家兩代著述，久已流傳海內外，然遺稿頗多，拙稿也不少，前雖承毛主席提倡，得出版數種，自去年出版社範圍改組縮小，稿久未印。有《釋詞源流匯編》一種，乃採清高郵王氏《經傳釋詞》，附以吳昌瑩《經詞衍釋》孫經世所補，合而爲一，蓋皆述詞字之流，而未溯其原也，先祖遺稿中有釋詞一篇，專釋詞字之原，足補王氏之缺，然文簡語約，人不易讀，乃爲補箋，與王氏書相合而貫通之，使人知詞字轉注假借之原，則源流具備，便於學者，庶於學術有裨，固爲專家所必需，而今大學、高中學生所當用爲參考者也。茲錄序例呈正，擬懇賜題辭，以弁卷端，用光拙著，並祈介紹中華書局速爲付印，俾莫年稍有貢獻於社會。[……]昔太沖〈三都〉，籍出安之序而流傳；昌黎之文，得歐公之譽而益著。雖不逮古人，而總理之學術勛望，則超皇甫、歐陽二公，亦他日歷史韻事也。附呈拙著《清史述聞》、《黃山樵唱》各二冊，希教正。^㉔

爲了能順利快捷地出版家人及自己的著作，朱師轍向中央領導人頻頻致函、奉書、求序，甚至不惜折腰，極恭維之能事，真可謂煞費苦心不遺餘力。在他的努力下，終於情況有了轉機，一九六二年六月陳毅給朱師轍回信，全文如下：

師轍先生尊鑒：

尊函及尊著均收閱，近日才送中華書局辦理出版，裁答延遲年餘，十分罪過，祈先生過諒。贈詩稱譽逾恒，令人慚愧。先生謂拙作使湖山生色，愚謂適得其反。先生住湖畔近十餘年，而著述精勤，垂老不衰，他日秉史筆者當首書先生，可斷言也。愚有志藝文，但苦於行役和外務，業餘捧場而已，言著作斷不以此自欺欺人。先生《黃山樵唱》我甚喜讀，詞格與夢窗爲近。嘆詠人民事業及其偉績，愚以此屬望於先生。能常以新作見惠，不勝感謝。災情甚重，夏

^㉓ 朱師轍之文稿散頁，寫於 1962 年 7 月 12 日，原件藏浙江圖書館古籍部。

^㉔ 朱師轍之信件底稿，無落款與寫信日期，原件藏浙江圖書館古籍部。

日又寒暑不定，千萬珍重。

陳毅 敬禮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日

在獲悉陳毅既獎譽又將自己書稿交中華書局付印的覆函後，朱師轍既激動又慚愧，因譜〈感恩多〉二闋以表示謝意，並希望將先代遺稿印成叢書，以能嘉惠儒林^㉕。

陳毅的嘉譽和出書的希望，再次激勵朱師轍勤奮著述。當時，朱師轍因年歲已高，雙手患了顫抖症，不能多寫字，他不惜出資請人幫助抄稿，得以繼續研究整理先人遺稿。可是他不會想到的是，六〇年代以後中國政治形勢的劇烈動蕩和變化，出版社的出版方針有了變動，再一次使他無法如願以償。當他接到出版社所退還的稿件後，憤慨寫道：「出版《續書集成》一部分，請其速印我稿，庶免鄰邦譏中國學術落後，該局仍不接受。又《釋詞源流匯編》亦今日講文字學者所需要，更宜提前速印。至我先代遺稿乃有清三百年來第一大著作，政府提倡文化之下，自當仿清季刊行《王船山遺書》之例為之排印。乃該局學識不充，不知高深專門學術之足寶貴，竟將書稿全部退還，既違背主席提倡，更阻礙中國學術之發展，殊堪詫異！」^㉖深居書齋不諳世事的老先生，自然無法理解當時中國「左」傾錯誤愈演愈烈的那種政治大氣候，於是只好將一腔憤懣，錯怪於中華書局的「學識不充」了。

朱師轍祖、父兩代遺著，是祖國古典文獻寶庫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朱氏十分珍視先人在學術上的重要貢獻，對它勤劬審慎，總結舊說，垂老不息，應該說是懷著一種尊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感情的。此後當他審度認清了當時中國社會的發展趨勢後，並不氣餒，很快調整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作詩稱：

空懷著述得藏山，手戰強書豈畏難。願寫新猷齊進步，聊供眾覽一開顏。^㉗

四、三代藏書^㉘

朱家世代皆是儒生，書香傳家，歷代積累收藏圖書上萬冊，一直保存在安徽黔

^㉕ 朱師轍：《黃山樵唱》。

^㉖ 朱師轍之信件底稿，無上下款與寫信日期，原件藏浙江圖書館古籍部。

^㉗ 朱師轍之詩稿散頁，寫於1964年，原件藏浙江圖書館古籍部。

^㉘ 筆者在撰寫本節有關內容時，得到浙江圖書館古籍部原主任何槐昌副教授的幫助，謹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縣石村老家。由於他們本人都是博通古今、學有所長的著名學者，所以朱家是因好學而好書，為治學而藏書，與一般賞玩古本的藏書家迥然異趣。由現已歸藏浙江圖書館的朱家藏書看，雖達數千冊，然大部分是清季特別是清道光年間至民初的通行本，明刻本及清初刻本雖亦間有，但較少見；宋元本則未有入藏。朱家藏書的另一個特點，是經部文字小學音韻書、史部正雜野史和集部詩文詞章酬唱集居多，前二者是因為朱師轍祖父輩在經學、史學上的造詣有意致之，後者則很可能是由於朱師轍及其父朱孔彰對詩詞的偏愛與精通的緣故。這幾類內容的圖書朱氏收集較為齊全，各地各版本都有，足以反映出道光以來這幾類內容圖書的出版概貌。由於朱氏三代皆為著名學者，學術著作涉獵文字音韻、訓詁考證、歷史文化、詩文詞曲等許多方面，他們自己也在各自的研究領域留下了一大批頗有見地的著作。據統計，三代遺著稿共有二百四十種（包括批校本在內），這是一批至今仍可供學術界服務而又不可多得的寶貴的學術財富。此外朱孔彰曾為曾國藩幕僚，又歷經三個書館的主持，保存了大量官場奏稿、公函原稿、信函底簿以及社會名流學者來往信件，這部分資料也彌足珍貴。

由於朱師轍教學職業流動性大，不能親自保管放在石村的這批藏書，因此托老冢侄媳代為保管。五〇年代初侄媳病故，書將無人照管，一九五一年從中山大學退休後，擇地杭州定居的朱師轍就打算將它們運到杭州親自保管。他在給浙江省統戰部余紀一部長的信中說：「吾擬今年令小兒俊異前往黔縣石村，將家中藏書整理運杭，以便為國家保存這批文獻，並以整理出版。望專署通知黔縣署給予協作照顧。」²⁹藏書運杭州後，一直保存在朱師轍的居所——杭州岳王路三十號。

但因生活所迫，藏書時有流失。朱師轍任教四十年，最後升到一級教授，底薪六百元。五〇年代初，中山大學公評教授工資分數折合得一五八元餘，當時亦算高薪，朱師轍退休時仍給原薪。因生活及研究所需靠原薪不夠用，朱師轍只得「藉稿費以混注」³⁰。由於年邁，雙手作顫，不能多寫字，又須支付抄書助手的工資，後來出版書稿受阻，稿費斷源，加上家人多病，因此從五〇年代末開始，朱師轍生活較為困難，時有變賣家中藏書以應急之舉。他在致某領導人信底稿中這樣說：「雖力為克服，仍須售書物以輔助。今年以來，物價增長，家人常有啼飢之憂。竊思以

²⁹ 朱師轍之信件底稿，無落款與寫信日期，原件藏浙江圖書館古籍部。

³⁰ 朱師轍之信件底稿，上款為「□□副主席」，無落款，並用紅筆注「未用」二字。

共產黨當國領導，毛、劉兩主席及先生執政，斷不致使口吃不飽。」^⑪一位在五〇年代初期曾倍受禮遇的著名學者，晚年的生活竟要靠變賣藏書來維持，這種境況不禁令人既同情，又無限感嘆。《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一書中對朱氏晚年生活的描述，不免有點過於樂觀和理想化了。但在當時「左」傾錯誤占據統治地位的政治大氣候下，大多數知識分子都在劫難逃，又豈是朱師轍個人的厄運呢？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造反風暴遍及全國，到處有紅衛兵和群衆組織造反，揪抓「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破四舊」，「砸爛一切封、資、修」，焚燒古籍書畫珍貴文物的火光沖天。在這一片混亂的形勢下，一個從清王朝過來的舊知識分子怎麼可能逃脫得了被批鬥、被抄家的厄運呢？終於，一批紅衛兵闖進了岳王路三十號朱家大門，連抄帶搶地拉走了朱家歷代收藏的字畫。由於事先準備不充分，書籍沒來得及抄走，紅衛兵準備第二次再搬。朱家幾代人積累的心血與治學必備的資料，即將面臨滅頂之災，朱師轍心急如焚，急中生智的他想到「紅衛兵來抄家，毛潤之主席可是紅衛兵的總司令」^⑫，便立即把毛澤東寫給他的信找出來，用鏡框裝好，高掛在家門口。此舉果然使紅衛兵驚訝之極，朱師轍居然和毛主席有來往！就不敢再進門抄家。在「文化大革命」狂潮和舉國「破四舊」的動蕩形勢下，不少公共圖書館的藏書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失，而這位「反動學術權威」的家藏圖書卻得以保存完好，這不能不說是靠朱師轍急中生智，借著毛澤東的威望而創造的一個奇蹟。

藏書雖然得以倖免劫難保存下來，但年邁體衰的朱師轍終於經受不了「文化大革命」的衝擊折磨，於一九六九年懷著滿腹疑問和痛苦，鬱鬱地與世長辭了。

朱師轍逝世後，其妻馮氏患有嚴重哮喘病，既沒正式工作，更無勞保，一九七〇年間遂向當時浙江省革命委員會文藝組提出捐獻家中藏書。浙江圖書館古籍部主任任何槐昌先生接省革委會通知後，即去朱家聯繫此事。馮氏提出一個條件，要求政府安排她本人一份正式工作。這在當時可是一個棘手的難題，何先生說明要錢或東西都可以幫助解決，安排工作則有困難；馮氏表示沒有商量餘地，就這樣，第一次沒談成。以後朱師轍的小兒子因「現行反革命罪」被判刑，關押在浙江金華監獄，留下其妻撫養兩個孩子，朱師轍小兒媳當時在浙江紅十字會醫院任護士工作，一個

^⑪ 同註^⑩。

^⑫ 據浙江圖書館古籍部原主任何槐昌副教授回憶。

月二、三十元的工資實難於維持生計，據說連房租費也交不起，無奈之下，只有陸續拿家中圖書去古舊書店變賣，以貼補生活費用。一九七五年浙江省革命委員會參事室的孟炳南先生與何槐昌主任聯繫，轉告朱家要把家藏圖書賣掉，要浙江圖書館去商談。為慎重起見，何先生先去上海同濟大學找朱師轍的大兒子徵求意見，其大兒子表示沒有意見，所得錢款也不要求分享。何先生又通過杭州上城區法院去金華找到正在服刑的朱師轍小兒子，告訴他其妻因生活困難要賣掉家藏圖書以補生計一事，並說明浙江圖書館可以捐獻的名義，給獎金五千元買下，並留出三分之一給他本人，向他徵求意見。朱師轍的小兒子表示最好不要處理掉，實在不行要賣掉，他也沒有意見。在浙江圖書館去朱家接收時，珍貴圖書已不很多，朱孔彰與社會名流學者及曾國藩、左宗棠往來信稿原件已經不在，但商定毛澤東、陳毅的兩封信一定要給浙江省圖書館，不能少。就這樣，朱師轍三代藏書的倖存部分全部歸屬浙江圖書館。筆者從當時整理的清單了解到，共有書籍一二〇五種，五九八七冊；另有三代遺稿本六九三冊，又三五束；並加毛澤東和陳毅的親筆信各一件。

我國歷史上的藏書事業大致可分為官藏和私藏兩大類。官家藏書在保存和流傳古代文化典籍方面的作用固然不可低估，但它的弊端亦正如吳晗所云：「大抵政府收藏多隨政治局面之隆替而興廢，且其采掇僅憑官司，無論精校丹黃，即鑒別真贗，品評得失，亦絕不可得。」^{③3}而我國私家藏書歷史源遠流長，藏書家可無衣，可無食，不可無書，他們根據各自的特點，在長期收藏典籍的過程中，積累了大量有特色的古籍。朱家藏書可稱得上是其中頗有特色的一家。朱師轍家藏圖書從其祖父朱駿聲時算起，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歷經改朝換代、戰亂烽煙、「文革」動蕩，卻能基本保存流傳下來，朱師轍是功不可沒的。

五、結緣杭州

一九五一年十月底，朱師轍從廣州中山大學退休，前往杭州定居，準備在杭州安度晚年。

這是朱師轍生平第四次來杭州。第一次是在一九〇一年二十二歲時侍奉父親遊杭，山青水秀、美麗恬靜的西湖給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一九三〇年，他又偕同三

^{③3} 吳晗：〈序言〉，《江浙藏書家史略》（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弟立三重遊杭州，這一次他遊覽了岳墳、玉泉，還參觀了文瀾閣《四庫全書》，看到新蓋的洋樓、新修的馬路，感到電燈點綴下「湖山益增壯麗，迥異昔時矣」^⑭，有詩記曰：「小別湖山三十年，重來鬢髮悵皤然。滄桑兒閱人間世，西子趨時亦逞妍。」「文瀾閣建自前清，四庫芸編負盛名，歷劫琅環喜依舊，雙丁拾補費經營。」^⑮一九三三年朱師轍第三次來杭時，已被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的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迷戀得如痴如醉，他在多首詩中寫道：「羈客偷閒卻返忙，宋莊遊了又汪莊」，「如此湖山如此景，醒時疑夢夢疑醒」，「重謁湖山素願酬，西施欲載苦無由」，「煙波縱戀終須別，只欠龍紋十萬錢」^⑯。從這些詩中我們可以看出，此時朱師轍已是流連忘返，並產生長居杭州的念頭了。

杭州係我國六大古都之一，自唐以來即負盛名。五代越國和南宋趙氏王朝的封建帝王以此為國都，浚湖築堤，遍植桃柳，廣建園林，宮闕殿堂遍布市肆街巷。到元朝，被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讚嘆成是當時「世界上最美麗華貴的城市」。清乾隆中期，因「思念江浙人文淵藪」，清政府在孤山之陽，清朝行宮聖因寺中築起文瀾閣，貯藏《四庫全書》，以光文治，供文人學子治學查閱，從而更使杭州形成了獨特的人文環境與學術的氛圍。這樣一個山青水秀、凝定靜謐的優雅環境和書籍匯萃之地，正是那類淡泊處世的遁隱之士與專注學問的性情中人傾心嚮往的地方，這也確實是吸引朱師轍前來杭州定居的一個原因。

朱師轍「時時縈幽棲之志」^⑰，他說：「隱者，蓄道德，能文章，志耽泉石，高尚其志行，足轉移風化，始可謂之隱。余家三代，皆有隱士之目。」^⑱朱師轍祖父朱駿聲，賞國子監博士，卻退隱黔縣石村，號石隱山人。父朱孔彰舉於鄉而隱居不仕，自號半隱山人。朱師轍企慕先人，自認為學術道德遠不逮前哲，但時有幽棲之志，故號充隱。他生於一八七九年，歷經兩個世紀的巨變，幾十年間，軍閥混亂，日寇入侵，顛沛流離，生活的憂患，使他萌生「自處之道，攜書歸隱黃山，或寄足跡西湖，著書以終此生」^⑲之念，屢屢詠詩云：「孤山欲訪林高士，願結鷗盟

^⑭ 朱師轍：〈庚午夏重遊西湖〉，《黃山樵詩鈔》（十卷本），卷4。

^⑮ 朱師轍：〈癸酉冬重遊西湖〉，《黃山樵詩鈔》（十卷本），卷4。

^⑯ 同註^⑮。

^⑰ 朱師轍：《充隱說隱》，原件藏浙江圖書館古籍部。

^⑱ 同註^⑰。

^⑲ 朱師轍：〈戊寅六十初度自述〉，《充隱詩稿》，第4冊。

共放舟」，「扁舟欲泛西湖去，聊借文瀾補舊編」，「卜築湖山志未酬，其志殆不易償也」^⑩。然而他卻不曾想到，其志竟在一九五一年秋如願以償。一九五〇年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的朱師轍已年逾古稀，時任廣東省文教廳廳長的杜國庠派廣州歷史學會秘書李稚甫探望朱氏，徵詢其退休後的打算，朱師轍不加思索地提出想去杭州。杜國庠將此情況匯報給當時主持廣東工作的葉劍英，葉劍英又致電華東區負責人陳毅請予關照，陳毅便通知浙江省政府做好安置工作。朱師轍臨行前由學校資助旅費二百元，因錢尚相差很多，再由杜國庠商諸葉劍英，又加送二百元作書籍搬運費。就這樣，一九五一年十月底，朱師轍懷著欣喜與感激的心情前來杭州定居。朱師轍能如願在杭州定居，與當時主持華東軍政委員會的陳毅向浙江方面打招呼有很大關係，從此朱師轍與陳毅也結下友情。

到杭州後，杭州市統戰部副部長胡成放來歡迎，並接洽解決住房問題，介紹說黃龍洞環境清幽，有房可以安排。朱師轍前往察看後，感到風景甚佳，惟地僻離市區太遠，家人買菜、小孩上學皆不便，因而謝之，並請求在湖濱一帶安置。不久即正式移居市區岳王路三十號，因躊躇滿志，喜而吟詩道：「小屋三間草草屋，岳王路畔任虛徐。碧悟濃陰涼消暑，朱墨新磨靜校書。高臥優遊客寄傲，狂吟快意便軒渠。山人不羨瓊樓美，覓得幽棲志亦舒。」^⑪朱師轍終於如願以償了。

朱師轍以一個歷經數朝的知名學者身分而倍受中央主要領導人的照顧禮遇，來杭州安居，當然引起省、市領導的重視，當時的浙江省主席譚震林和杭州市長吳憲等都直接詢問和照顧他的生活安置問題。不久他被聘為省政治協商委員會的委員，一九六三年又由省文化局提議，擬聘其為省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他經常以政協委員的身份在全省各地視察，並應邀出席各種學術討論會和紀念活動。「重晤闕別十八年的西湖倍益親」^⑫，朱師轍對西湖情有獨鍾，厚愛有加，平日從事研究工作之餘，便盡興遊覽西湖名勝。他被美麗的景色所陶醉，為世間的滄桑而感慨，詩思如泉湧動，寫下了大量有關杭州名勝的詩詞，如〈西湖雜詠八章〉、〈西湖閒步〉、〈蘇堤閒眺〉、〈湖畔〉、〈春來〉等，即景即情，詞美意深，在本來就誘人的景

^⑩ 朱師轍：〈退休杭州雜詠四章〉、〈粵遊雜感五絕〉，《充隱詩稿》卷7；〈一九三八年元旦戊寅六十初度自述〉，《黃山樵詩鈔》（四卷本），卷3。

^⑪ 朱師轍：〈移居岳王路卅號寄廬〉，《充隱詩稿》，第7冊。

^⑫ 朱師轍：〈衡叔畫松相贈因謝以詩〉，《充隱詩稿》，第7冊。

觀中更融進了令人遐想的意境和內涵，為杭州的人文景觀增色，給後人留下不可多得的文化遺產。

朱師轍在杭州遍訪名士學者，當時在杭州安居養志的有馬一浮、黃賓虹、張宗祥等文化名流，朱師轍經常造訪，與他相聚會晤，彼此寫詩唱和，談道論學。馬一浮住蔣莊二樓，平日裏足不下樓，惟獨給朱師轍送別陪行到樓下的庭園中。黃賓虹住棲霞嶺，年近九十，朱氏敬佩黃賓虹畫品高，常去拜訪，有〈南鄉子·重陽棲霞嶺訪黃賓虹〉詞曰：

迅景又重陽，勝地西湖氣漸涼。老去看花無意緒，常常，俊約登臨總未遑。

佳節悵彷徨，戲向栖霞遠訪黃。欲採金英先獻壽（翁明年九十壽），望望，卻遇山僧到草堂（時有大佛寺紫霞洞諸僧訪翁）。⑩

黃賓虹也年年約朱氏參加生辰聚會，朱氏總是賦寫賀詞前往。一九五三年元旦黃賓虹九十壽辰，朱氏寫了〈春光好·祝遐齡〉：

遐齡九十誰儔。戲塵宇、逍遙自由。今日元宵逢勝會，歡滿杭州。名山恣意遨遊。寫圖畫、流傳五洲。同祝期頤無限壽，著述千秋。⑪

張宗祥在一九四八年六十七歲時自寫挽聯「到老姓名無黨籍，一生精力在圖書」，並云等他日謝世即以此聯懸靈堂作自挽。一九五四年初朱師轍見之笑曰：「此二語亦可贈余。」到這年冬天朱師轍再次拜訪時，張宗祥笑著對朱師轍說：「前聯可以贈君。」那是因為一九五四年春，經何燮侯介紹，張宗祥加入「民革」，此聯不可用了。朱師轍得聯而喜，歸家即懸之壁閣，並譜《南歌子》詞以謝：

黨派時時變，圖書日日新。駒光影迅百年春。回首滄桑，知是那朝人？⑫

朱師轍還通過書信與杭州以外的故友保持友情，與廣州中山大學的陳寅恪先生時常有詩詞唱和。這裏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五三年朱師轍因朝鮮戰場停戰而賦詩一首致陳寅恪：

聞朝鮮停戰簽字喜賦三疊前韻寄寅恪

喜聞勝利說遼陽，停戰銘功大吉祥。誰建良謀和冒頓，莫教空想夢高唐。

除根須服消毒散，培本尤宜大補湯。幾度羈魂工部咏，何時結伴好還鄉。

⑩ 朱師轍：《黃山樵唱》。

⑪ 同註⑩。

⑫ 同註⑩。

對此詩陳寅恪是否唱和過，一直沒有根據。這次我們在整理朱師轍遺著時，發現他的《充隱詩稿》謄清本（第四冊至第十冊，抄錄自抗戰時期至一九五四年創作的詩集）老式黃紙本對折頁內層，夾有一頁手書陳寅恪次韻奉和朱師轍詩稿二首，其中一首正好是奉和朱師轍的朝鮮戰場停戰詩：

熱不成寐次少老聞停戰詩韻

神光離合作陰陽，羊首懸門豈賣羊。孤注澶淵安北宋，詭盟梨樹誤中唐。

千秋舊史金爲鏡，九夏炎威火沸湯。欲夢高寒冷肝肺，可憐無路黑甜鄉。

經核對筆跡，此詩為陳先生夫人唐賓女士所錄，陳先生雙目失明後，一切文字皆由陳夫人筆錄，加鈐「陳寅恪」陰文印，由此可以判定此詩為當年陳寅恪寄贈朱師轍詩的原件。由朱陳二人的詩可以看出，在對待當時國際國內的局勢上，二人同樣以古喻今，但各自表達的複雜感受是大不相同的^⑯。

朱師轍生於中國歷史中多難而黑暗的時期，早年和舊時代一些有良心而向往光明、希望對國家對社會有所貢獻的學者一樣，苦志讀書，勤奮教學，以文章著述為經世之大業，期待憑個人的才能盡匹夫興亡之責。他以後的人生歷程曲折多變，他也由一個單純的書生，演變成一位善於審時度勢的文化名人。他在學術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經史百家，訓詁校勘，無不淹通；同時又擅長詩詞創作。對這樣一位學有專長又經歷特殊的學者進行較全面的研究，無疑可以加深今人對於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文化界風雲變幻之際，萬般事態、各種人物的真切理解。但由於筆者水平有限，以上對朱師轍的生平和著述所作的介紹是很粗略的，進一步的研究，尚有待於學術界同好的共同努力。

^⑯ 陳正宏、丁紅：《新發現的唐賓手書陳寅恪詩》，《中華文史論叢》，出版中。